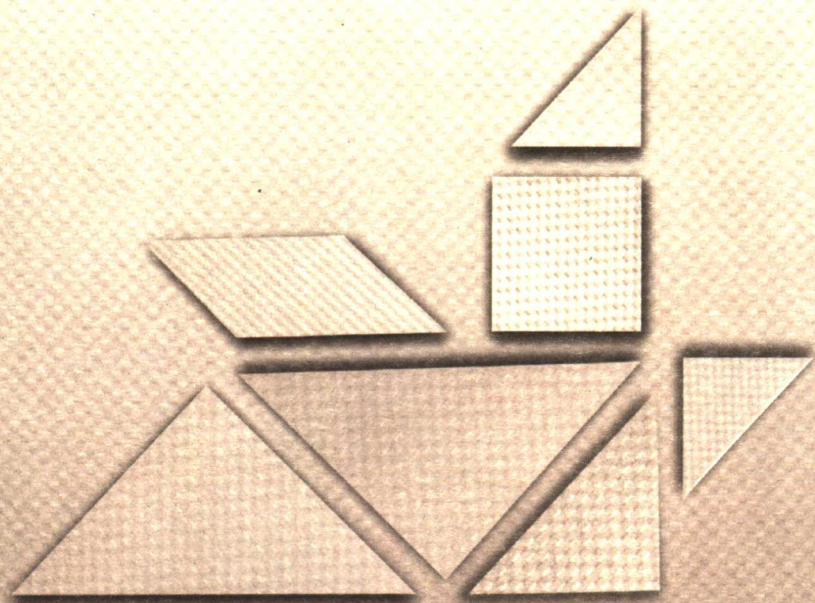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法国近代哲学



冯俊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法国近代哲学

冯 俊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近代哲学/冯俊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12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ISBN 7-5608-2926-0

I. 法… II. 冯… III. 近代哲学—研究—法国—17~18世纪 IV. B5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9596 号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法国近代哲学

冯俊著

责任编辑 沈志宏 责任校对 徐 栩 封面设计 林家阳 陈益平

出 版
发 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印 张 18.75

字 数 544000

印 数 1—3100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8-2926-0/B·18

定 价 35.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丛书总序

法国现代派文学的创始人和后现代思想的启蒙者波德莱，在评论雨果的《悲惨世界》时说，作为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他具有诗人般的才华，兼备思想家的深刻洞见，又不愧为最体贴民情的慈善家。正因为这样，雨果才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将一切几乎不可能表达的事物，表现和塑造成为与诗歌美同具感染力的世界，不断地从真实中分离出崇高、又从崇高中分离出真实，把这个富有魅力、又充满邪恶的神秘世界，同悲喜剧并存的人生，有机地旋转在同一舞台上，启发世人用心地学会生活的艺术。

其实，在法国的文化史上，自法兰西民族开始创立自己的语言，逐步从罗马帝国独立以后，在各个历史时期内，总是大师辈出，个个像雨果那样，既有作家的创作能力，又有诗人般的才华和哲学家的敏锐思想；而到了20世纪，当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危机异常尖锐、人类创造灵感惨遭厄运的时候，正是当代的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诗人们，很突出地以其惊人的创造生命力，独领风骚，将20世纪谱写成富有思想性、可与任何伟大时代相媲美的历史乐章。

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恰巧在“中法文化年”的历史机遇中建立。它的适时诞生，正好见证了对法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以及对推动中法文化思想交流的时代意义。由本中心主编，并受五位德高望重的法国哲学家所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以及全国杰出的同行们所构成的编委会的监督和指导，《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秉承开放和自由的学术研究原则，一方面将及时地收集和发表我

们这个时代对于法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专著,另一方面还要有步骤地翻译优秀的法国思想文化作品,以促进两国的思想文化交流。为此,我们竭诚欢迎全国研究法国思想文化的同行们,共襄盛举,将《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真正办成开放而又活泼繁荣的中法文化交流的学术园地。

高宣扬

于上海同济大学

2004年10月

绪 论

法国哲学是整个滥觞于希腊文明的欧洲哲学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支,法国哲学的发展是与整个欧洲哲学的发展紧密相连的,因而研究法国哲学史就应当把法国哲学放在整个欧洲哲学史的宏观背景中来考察。然而,法国哲学作为一个特殊国别的哲学史,又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独有的思维特点和特殊的民族风格,这些是我们研究法国哲学史时更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一讲起“法国近代哲学”,自然就会使人想起“法国古代哲学”。在中世纪法国出现过像洛色林(Roscelin, 约 1050—1123)、阿伯拉尔(Pierre Abélard 或 Abailard, 1079—1142)这样一些经院哲学家,但由于当时哲学只是神学的附庸,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更不可能有独立的法国哲学。文艺复兴时期在法国出现了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1494—1553)和蒙台涅(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 中文又译为蒙田)这样一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和德布律埃(Guy de Bruès, 1554—1562)、桑奇(Francisco Sanches, 1551—1623)和夏隆(Pierre Charron, 1541—1603)等怀疑论者,但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主要是对中世纪教会和封建神学的揭露和对经院哲学(philosophie scolastique)的怀疑,富有批判精神,缺乏理论建设,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法国哲学。因而,法国近代哲学实际上就是法国哲学史。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是法国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他创立的理性主义在法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笛卡尔哲学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他提出了以“我思”及“自我意识”为基础、崇尚理性和逻辑思维的理性主义的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使哲学的视线又重新回到自然和人这个哲学的伟大主题上来,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因而他开启了西欧近代哲学。笛卡尔是一个彻底的二元论哲学家,在他那里,一方面物质自然界是遵循着机械运动规律的必然世界,另一方面是有“我思”、自由意志的精神世界,在他将世界二元化的同时,也向人们揭示了精神和物质、必然和自由和关系。

17世纪的法国哲学是围绕着笛卡尔展开的。笛卡尔的第一哲学和自然哲学对后世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也招致了两方面的批评。科德莫瓦(Géraudde Cordemoy, 1628—1684)、雷吉斯(Henricus Regius, 或名:Le Roy, 1632—1707)等人继承了笛卡尔的自然哲学思想,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 1598—1679)重点继承和改造了笛卡尔的第一哲学。伽森狄(Gassendi, 原名: Pierre Gassend, 1592—1655)对笛卡尔“二元论”批判的出发点是唯物主义的原子论,而阿尔诺(Antoine Arnauld, 俗称: le Grand Arnauld, 1612—1694)和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 中文又译为: 帕斯卡尔、巴斯噶、帕斯卡尔、巴斯伽尔)对笛卡尔批判的出发点是非理性主义和冉森教派(Jansénisme)的宗教哲学。至于富歇(Simon Foucher, 1644—1696)和于埃(Pierre Daniel Huet, 1630—1721),只是运用古代怀疑论的方法对笛卡尔主义的认识论进行批判。

可以说笛卡尔、帕斯卡尔和马勒伯朗士三人的哲学,确立起了

法国近代哲学的基调。帕斯卡尔将“几何学精神”(l'esprit de géométrie)和“敏感性精神”(l'esprit de finesse)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几何学精神”尽管能够构造出公理体系,但不能证明“第一原理”,而宗教和道德的“第一原理”只有通过“敏感性精神”才能获得。马勒伯朗士也认为我们不能直接认识世界,人是在上帝之中看一切。这些都意味着在笛卡尔理性主义建立的同时,非理性主义和宗教哲学就相伴而生。不过,理性主义在17世纪法国哲学中是占绝对上风的主流。

18世纪是启蒙的时代,17世纪的理性主义原则变成了一种强大的现实力量,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宗教神学是这一时期哲学的两大主要任务。崇尚理性、研究自然、鼓吹进步,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动力,哲学和整个时代的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反对形而上学,这是启蒙在哲学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在17世纪,无论理性主义哲学还是非理性主义、宗教哲学,都是以形而上学即本体论的形式出现的,而启蒙哲学就是从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抽象的绝对开始的。这不仅表现在贝尔(Pierre Bayle, 1647—1706)、伏尔泰(Voltaire,原名:François Marie Arouet, 1694—1778)、拉美特里(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 1709—1751)和孔狄亚克(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1715—1780)等人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体系的批判,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百科全书派”(Encyclopédie)用战斗的无神论对神学唯心论作出的无情抨击。贝尔的怀疑论和梅利叶(Jean Meslier, 1664—1729)的哲学是启蒙运动的先声,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 1657—1757)和伏尔泰等人虽然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他们也对教会的罪恶行径作了无情的揭露,驳斥了宗教上关于神的启示、奇迹等迷信,反对信仰,弘扬了理性。特别是百科全书派抛弃了神学对自然界所作出的一切解释,依据“从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的原则,提

出了一整套“自然哲学”的思想,这是当时各门自然科学水平的最高总结和理论概括。

法国的启蒙学者们要揭开宗教神学给社会和历史罩上的神秘面纱,力图理解人的本性、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他们从人性论、自然法理论出发,对历史和社会作出新的解释,所以社会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应运而生。

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是社会政治哲学的重要奠基人,他们反对封建专制、提倡自由平等,主张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民主国家及“三权分立”的思想,不仅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武器,而且成为后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国纲领。

人们一般将维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看作是近代历史哲学的始祖,然而在欧洲近代先于维柯对人类历史作哲学反思的哲学家是法国的波舒哀(Jacques Bénigne Bossuet, 1627—1704),这位法国的太傅想复兴中世纪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 354—430)主义,将历史看作是一个朝着最终目标进步发展的过程,尽管他的学说仍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但不失为一次有价值的探索。虽然伏尔泰的历史观念与波舒哀大相径庭,但他把自己的《论世界历史和论民族的风俗与精神》(Essai sur l'histoire générale et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1756,简称《风俗论》)一书看作是波舒哀《世界史讲话》(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 1681)的直接继续。我们可以挑剔伏尔泰历史观点的深刻性以及他的历史虚无主义,但是伏尔泰作为法国哲学史上系统地阐发历史哲学的第一人是无可挑剔的。除《风俗论》外,他的《历史哲学》(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1765)、《历史新思考》(Nouvelles 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oire, 1744)、《历史评论》(Remarques sur l'histoire, 1742)都是对后世很有启发的历史哲学论

著。伏尔泰的好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Baron de L'Aulne, 1727—1781),虽然是一位重农学派(physiocratie)的经济学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哲学家,他认为人类历史是进步的,这种进步大体上分三个阶段,即宗教阶段、哲学或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他关于历史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e)解释成为下一个世纪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历史观的先导。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差不多是18世纪法国哲学的共同特征(卢梭除外);孔多塞(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在他的《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景观概览》(Esquisse d'un tableau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1794)中,同样将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从黑暗走向光明、从野蛮走向文明、未来充满无限进步的渐进过程,并且将科学文化的发展看作是这一进步的标志。

伏尔泰对“风俗和精神”的探讨,可以说是开了当代文化人类学之先河,各族的文化差异表现在习惯、风俗、家庭生活和共同生活、工艺与技巧、科学、宗教和艺术的差异。伏尔泰和沃文纳哥(Luc de Clapiers, Marquis de Vauvenargues, 1715—1747)是最先使用“文化”(culture)一词的人,在他们那里,“文化”是指训练和修练心智(思想或趣味)的结果和状态、某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实际成就、良好的风度和社会风范、文学艺术和科学。“文化”是能通过教育所获得的东西。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Le 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1750)、《社会契约论》(Le Contrat social, 1762)、《爱弥尔》(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1762;完整译名是:《爱弥尔,或论教育》),以及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的《论精神》(De l'esprit, 1758)和《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De l'homme, de ses facultés intellectuelles et de son éducation, 1772),同样是文化哲学的最早经典。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以前唯物主义发展

的最高成就,其中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等人的经验论就是直接从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出发的。同时,他们在总结当时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将唯物主义的观点推广到科学的各个门类和社会领域中。

从其理论特色来看,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分为两支,一支是“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它继承了笛卡尔的物理学中的机械论思想,并将机械论极端化。例如,拉美特里将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思想贯彻到底,提出了“人是机器”的极端机械论。霍尔巴赫(Paul-Henri Dietrich, Baron d'Holbach, 1723—1789)将整个世界看作是完全由机械因果性决定,一切都是必然,否认偶然性的存在,最终导致了宿命论。这一派哲学虽然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但是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另一派“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它主要是以进化论作为它的科学基础,力图揭示世界的整体联系,把世界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该派的主要代表是毕丰(Georges 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1707—1788)、狄德罗以及后来的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Marquis de Laplace, 1749—1827)。该派虽然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水平,但是它阐发的辩证法思想,成为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主要思想来源。

二

我在这里将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这个时期的法国哲学称之为“后启蒙时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哲学问题是启蒙时代(Age of Enlightenment)哲学理论的继续延伸,它主要是围绕着继承发扬启蒙时代的哲学精神,还是反对、扼杀启蒙时代的哲学精神而展开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观念学派(les idéologues)、实证主义、精神论(spiritualisme)运动、生命哲学和人格主义(personnal-

isme)等许多新哲学流派,产生了梅纳·德·比朗(Maine de Biran, 原名: Marie François-Pierre Gonthier de Biran, 1766—1824)、库赞(Victor Cousin, 1792—1867)、孔德、勒努维埃(Charles Renouvier, 1815—1903)、拉韦松(Félix Lacher Ravaisson, 1813—1900)、布隆代尔(Maurice Blondel, 1861—1949)、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等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正是在这个时代,法国哲学才显示出它的丰富色彩和民族特质,它是法国哲学从近代走向现代的桥梁。

关于后启蒙时代哲学的具体内容,作者将计划另作一本专著再详述,在此将其哲学的主要问题作一概述,昭示给读者。

1. 社会历史观的争论

这个问题表现为启蒙时代社会历史观的认同或反对。从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历史观来看,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它不仅使法兰西民族获得了解放、再生和自由,同时也给世界上其他民族带来解放、生机和自由,它是自宗教改革以来资本主义精神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胜利。然而也有人把法国大革命的胜利看成是一场灾难,它破坏了社会的基础和稳定,扼杀了法国的民族传统,抛掉了道德和社会统一的宗教基础。

从哲学上来否定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哲学派别是传统主义。传统主义的特点是坚持法国的政治传统和宗教传统,反对革命精神,攻击启蒙哲学,反对理性主义。其思想先驱是圣-马丁(Louis Claude de Saint-Martin, 1745—1803),正当启蒙运动轰轰烈烈之时,他就极力反对启蒙运动的哲学,以恢复旧的形而上学和宗教唯心主义的神秘学说来与之对抗。传统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 1753—1821)就继承了圣-马丁的思想,认为在人类历史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历史是

神圣天意的作用,而个人不过是被天意所利用的工具。他仇视革命,企望恢复帝制,将大革命提出的人民主权说成是没有根基的,将民主的成果说成是社会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德·波纳尔(Louis de Bonald, 1754—1840)也认为,在政治社会中主权应该属于君主而不是属于人民,在他看来,革命不过是已往社会弊端的登峰造极,必将有一个人能使社会摆脱这种无政府状态而恢复其自然的秩序,这个人就是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可见传统主义就是在哲学上为拿破仑恢复帝制作理论说明。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是对启蒙哲学家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19世纪上半叶,当法国无产阶级正在成长之时,法国出现了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 1760—1825)、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和普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和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和罪恶,提出了要建立更加幸福、合理、和谐的社会制度。

折衷主义(éclectisme)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官方哲学,它是以库赞等人为主要代表的。这种折衷主义不仅表现在哲学理论上,将感觉主义、常识哲学、观念论和神秘主义调和在一起,同时还非常突出地表现在政治态度上,提出可以建立一种在自身中综合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中各种有价值因素的社会制度。传统主义梦想恢复绝对的君主制,社会主义理论家则要求扩展法国大革命的成果,用更理想的社会制度来代替现存的社会制度,而折衷主义企图找到一条中间路线,要求君主立宪,这反映了他们资产阶级的调和精神。

实证哲学的创始人孔德在社会历史观上继承了杜尔哥、孔多塞、圣—西门和进化论的思想,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上升、前进的过程,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社会历史像生物界一样是一个

连续进化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处在社会发展的总体链条之中。与人类理智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对应,人类历史也经历了“神学的军事时代”、“形而上学的法学时代”、“科学的工业时代”三个阶段。在这里孔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最高、最完善的社会。

在后启蒙时代社会历史观方面的争论尽管异常激烈,但最终是以代表18世纪启蒙运动精神的历史理论的胜利而告终。各种学说的登场,是与法国大革命胜利、拿破仑恢复帝制、法国资本主义制度最后确立及稳定这一历史进程相一致的。

2. 形而上学的重建与拒斥形而上学

重建形而上学和拒斥形而上学是这个时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方面,由于启蒙哲学对已往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个时期有些哲学家企图重建新的形而上学,从梅纳·德·比朗至柏格森,建立起一长串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他们分别以心理学、道德和宗教来作为自己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础。

梅纳·德·比朗最初属于德斯蒂·德·特拉西(Antoine Louis Claude, Comte de Destutt de Tracy, 1754—1836)创立的“观念学派”,继承的是启蒙运动的精神,特别是孔狄亚克和卡巴尼斯(Pierre Jean Georges Cabanis, 1757—1808)等人的哲学思想。“ideologie”在这里不是指“意识形态”,而是指“观念学”。从字面上看,它要研究的是观念的来源、观念在语言中的表现和在推理中的结合,而实际上在它的创始人那里,“观念学”一词是关于人的机能及其活动的研究,观念学所要建立的是一门关于人的本性的科学。

梅纳·德·比朗就是遵循观念学的这一思路,要建立一门关于人的科学。他把人看作是一个能动的、自由的主体,它受其意志

的活动来解释,自我的存在是在对意志的努力的直观中发现的,自我直观到自己就是一切意志现象的原因。所以,梅纳·德·比朗套用笛卡尔的公式:“我意欲,所以我存在”(Volo, ergo sum)。他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反省心理学,形而上学是“关于内在现象的科学”或者说是意识现象学。

从“观念学”和梅纳·德·比朗引出了 19 世纪后半叶法国哲学的两大思潮,一是从拉韦松开始经富耶(Alfred Fouillée, 1838—1912)到柏格森的“精神论运动”;一是奥雷-拉普律纳(Léon Ollé-Laprune, 1839—1898)和布隆代尔为代表的宗教哲学。

“spiritualisme”在 19 世纪法国哲学中当然不是指“唯灵论”,因为它与认为一切物体皆有灵魂的学说毫无关系,此处应译作“精神论”。它是指从拉韦松开始,经拉舍利埃(Jules Lachelier, 1832—1918)和富耶、到柏格森而完成的一场哲学运动。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从本质上来讲是对“精神”、自我内在生活的直观。他认为科学所关心的是物质世界,而形而上学则为自己保留了精神世界。形而上学和心理学都研究精神,但心理学研究精神用的是研究物理对象的还原分析方法,而形而上学则是对生动的内部精神生活进行直观或对“绵延”(durée)直接的意识,因而形而上学与科学在其对象和方法上都是有区别的。柏格森认为要真正认识某些活生生和有机的东西,就是要从内部去认识,对于整体的认识只有通过直觉才能把握;这些思想都是得益于梅纳·德·比朗向内心追求真理的精神论思想。

人们常说,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中,德国哲学中的三 H 传统,即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而在法国哲学中有三 B 传统,他们是梅纳·德·比朗、柏格森和布隆代尔,即除了梅纳·德·比朗和柏格森之外,还有布隆代尔。布隆代尔是一位天主教哲学家,他认为在人的内心

深处有一种追求超自然的需要,人的精神缺乏自足性而向往超验世界,人要使自己成为上帝。他把“活动(action)”这种人的基本的意志作用或对于超验世界的动力取向,看作是主体的推动力,寻求自我实现的个人的渴望和运动,科学和哲学的思想与知识都植根于人的这种基本活动,它们的产生、意志和目的,也只有根据主体的这种根本的动力取向才能得到理解。布隆代尔的这种“内在性”(internality)方法,即通过对能动主体的反省,“从内部”通向形而上学的方法,正是梅纳·德·比朗思想的特征。从梅纳·德·比朗到柏格森和布隆代尔这种一脉相承的建立形而上学的三B传统,最终又可以溯源于帕斯卡尔和马勒伯朗士。当然,与笛卡尔从主体的自我意识出发来建立形而上学的思维路径也是分不开的。

在后启蒙的时代,与重建形而上学这一特征并存的另一突出特征是:拒斥形而上学。

这一特征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中集中地体现出来。孔德的实证哲学认为,人类精神的发展经历着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人类精神探索的主要目标是万物的内在本性、现象的根本原因或最后原因,追求一种绝对,用超自然的主体的作用来说明一切现象。而**形而上学阶段**不过是神学阶段的改头换面,只不过是把超自然的人格神换成了一些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实体和无所不包的**自然**。**实证阶段**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实证知识才是真正的科学知识,在这里人类精神不再企求绝对的概念,不再探求宇宙的起源和目的,不再求知各种事物的内在本质,它只关心现象和可观察事实,把推理和观察结合起来,发现现象间的实际规律。所以孔德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他不仅要反对“希腊学派关于本体论的议论”、希腊本体论在中世纪哲学中的变体、近代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同时还要直接反对他同时代以梅纳·德·比朗等人为代表的观念论者的形而上学。

19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法国出现的以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é, 1854—1912)和迪昂(Pierre Maurice Marie Duhem, 1861—1916)等人为代表的科学哲学,与实证哲学一脉相承,实证哲学家们所讨论的拒斥形而上学的问题,在科学哲学中进一步展开和深化。彭加勒认为,科学能使我们认识到的不是事物的本质,不是自在之物的本性,通过科学所获得的知识只是呈现给我们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的知识,事物间的关系是唯一的客观实在。由此推之,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不可能是科学。与彭加勒不同,迪昂并不排斥形而上学的存在,而是力图将形而上学与科学分开。他认为,形而上学家要去解释存在,要剥开罩在存在上面的面纱去发现真正的实在。而物理学家认为可感现象就是存在全部。所以,我们认识的是可感现象间的关系,但是人们往往有一种自然信念,认为在可感现象之外总有某种东西存在,不过这种自然信念在物理学中是无法证实的。这种自然信念是形而上学存在的根据。比迪昂更进一步,梅耶松(émile Meyerson, 1859—1933)不仅承认在科学之外形而上学有存在的必要,而且认为科学本身就离不开形而上学,或者说与形而上学不可分。他认为,科学不单纯是描述性的,科学也应该是解释性的,科学就是要解释现象的原因,人们总是通过因果的解释来理解现象,总是要去追求那种超验的东西、巴门尼德(Parménide,或 Parmenidês,约 544—450 BC)式的存在,这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内驱力,是理性给自己确立的理想目标;尽管这个目标永远不能达到,但它绝非无意义,它可以使科学不断地去追求、去探索。

可见,在法国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仿佛是依照一种逻辑的路径展开着,从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时代,到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和 19 世纪的实证主义批判和排除形而上学,这是一种向对立面的转化,从迪昂将科学和形而上学分开到梅耶松将科学与形而上学结合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逻辑的综合,从 17 世纪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到梅纳·德·比